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何心隐

HE XINYIN

刘克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何心隐

刘克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心隐/刘克稳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 4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6359-1

I. ①何… II. ①刘… III. ①何心隐(1517~1579)
—传记 IV. ①B24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226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旭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何心隐

HE XINYIN

刘克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60mm×960mm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千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5415-6359-1

定价: 16.80元

目 录

引言	001
第1章 早年的成长之路	004
成长背景	004
早年学术陶养	013
心学思潮鼓荡	017
第2章 中年变志，泰州学风的洗礼	027
中年变志	027
拜师颜山农	034
泰州学风的洗礼	037
第3章 创办聚和堂	042
儒家社会理想	042
实践先导	047
聚和堂的创办始末	048



001



002

第4章 讲学遍江湖 ————— 054

何心隐讲学的四个阶段 ————— 054

何心隐讲学的显著特征 ————— 062

何心隐讲学的深远影响 ————— 067

第5章 力抗权臣，只身殉道 ————— 072

结怨张居正 ————— 072

何心隐之死 ————— 076

悲剧的根源 ————— 081

第6章 璀璨的哲思 ————— 088

哲学思想 ————— 088

政治学思想 ————— 095

社会学思想 ————— 099

伦理学思想 ————— 108

教育学思想 ————— 114

美学思想 ————— 118

思想特征 ————— 134

附

年谱 ————— 153

主要著作 ————— 154

引言



001

何心隐是 16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之一，作为泰州学派的一股中坚力量，是明代儒学从传统迈向现代之路上不可或缺中间环节之一。明正德十二年（1517），何心隐出生于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他原本姓梁，名汝元，又名夫山，后来为了逃避严嵩党羽的追杀被迫更名换姓，以“何心隐”作为自己讲学传道的名号。他的一生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四朝，充满了传奇和坎坷。他年纪轻轻就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了成功，高中乡试魁元，但却在接触到泰州学派思想后，毅然改志，放弃科举之路；他积极实践自己的理想，在家乡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乌托邦社会组织——聚和堂，但是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压迫下，理想最终破灭；他以布衣之身，讲学传道于五湖四海，却又屡次参与朝廷的政治斗争，铲除奸相严嵩，力抗权臣张居正，最终落得个杖毙狱中的悲凉下场；他以孔孟的正宗传人自居，一生从事儒学平民化的事业，但又结交社会各色人等，上至达官贵人，下有贩夫走卒、江湖侠客……他的叛逆思想和出轨行为，虽然屡屡为自己带来灾难，但在思想史上却赢得了应得的尊重。

何心隐一生的经历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的早年科举生涯，时间是从他出生的正德十二年至嘉靖二十五年

(1546)。30岁之前的何心隐走的是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必经的科举之路。少年聪慧的他，博览群书，积极参与科举考试，并在嘉靖二十五年的乡试中，一举夺得第一名，深受考官的好评，由此获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和凭证。但是，就是在这次乡试后不久，他就接触到了阳明心学泰州学派颜山农的思想，毅然决定放弃科举道路，改志投身于儒学平民化的事业中去。

第二个阶段他改志向心学，拜颜山农为师，学成返乡创立聚和堂，时间大概是从嘉靖二十六年到嘉靖三十八年期间。嘉靖二十五年，何心隐高中乡试魁元后不久，就正式拜师颜山农，接受泰州学派思想的熏陶。由于与老师颜山农志趣不合，几年之后返回家乡永丰县传道讲学，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学者生涯。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何心隐37岁那年，他利用自己在家族中的影响力，在家乡永丰县梁坊村创办了聚和堂，开展社会改造试验，以此实践自己的理想社会主张。聚和堂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由于反抗额外赋税，对抗官府并闹出人命，作为组织领导者的何心隐因此获罪入狱。他先是被判处绞刑，革去一切科举功名，后改为充军贵州。在同窗孝感人程学颜的援救下，通过胡宗宪与江西巡抚何迁的疏通，何心隐才得以出狱，不久离开家乡投奔程学颜，暂时成为胡宗宪幕府中的一员。聚和堂也因为何心隐的离开，失去了主心骨，虽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基本陷入瘫痪，名存实亡了。

第三个阶段是他北上京城，参与倒嵩运动，时间是嘉靖三十九年至嘉靖四十一年。由于程学颜升任太仆寺寺丞，何心隐就离开胡宗宪幕府，跟随程学颜一同北上京城。在北京三年期间，何心隐寄身于江西会馆，开展讲学活动，其间结识了一大批阳明心学派的朝廷官员，如徐阶、张居正、耿定向等人。当时，正值倒嵩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他也因此卷入其中，在徐

阶等人的支持下，与道士蓝道行合谋用计离间了嘉靖皇帝与严嵩之间的信任关系，并最终促使嘉靖皇帝下定决心罢黜严嵩。这样，何心隐受到了严党的追杀迫害，被迫混躲在程学颜的归殡队伍中，狼狈逃离北京城，途中被迫更名改姓“何心隐”，从此亡命江湖。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的游学、讲学生涯，时间大概是从嘉靖四十二年直到万历七年（1579）他走向生命的尽头。这16年的漫长岁月，正是何心隐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他辗转于福建、江西、湖北的孝感，以及重庆等地讲学布道，宣扬泰州学派思想，推进儒学平民化进程。但他主要的活动区域仍然是程学颜、程学博二兄弟的家乡湖北孝感，孝感一时间成为影响全国的讲学活动中心。然而，由于何心隐在讲学过程中，多有抨击时政之举，受到了权臣张居正的厌恶，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以“妖逆”之名逮捕入狱，最终惨死狱中。

总之，何心隐天赋聪慧，性格果敢坚毅，悲天悯人，言行如一。他的叛逆思想和种种出格行动，具有了“赤手搏龙蛇”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的思想和言行源于16~17世纪古老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最早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时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他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冲破传统桎梏走向现代转型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之一。

第 1 章

早年的成长之路

成长背景

何心隐出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主要活动在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当时正是明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专制政治日渐腐败，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不断涌现，国势逐渐走向衰落。然而在经济、思想、社会生活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却有新的因素破土而出：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阳明心学兴起，各种讲会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早期启蒙思想的种子开始发芽；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教育也得到普及和发展。因此，何心隐生活的中晚明是一个内忧外患、君昏政暗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思潮激荡、新思想成长的转型期。

在政治上，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不断走向恶化的朝代。明朝初年，同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样，朱元璋为了朱家的江山永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强化皇权。一是通过“胡惟庸谋逆案”，废丞相，设内阁。二是设立厂卫制度。明太



祖朱元璋设立厂卫特务制度原本是作为当时的监察机关和言官制度的补充，但后来却变成了统治者钳制官吏和百姓的暴力工具。三是整顿吏治，严禁玩忽职守、蠹害人民，“空印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明王朝很快实现了安定和统一，社会经济也走向了复苏和快速发展的道路。当然，这些专制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步步将这个专制王朝推向毁灭的深渊。其直接恶果是到了明代中晚期，由于君主获得了绝对独裁的权力，士大夫成为皇帝的奴仆；特务的恐怖统治与宦官专权在正德、嘉靖年间达到高潮，严重损害了明代政治的活力。

何心隐所生活的明代中晚期，虽然成熟稳定的文官制度顺利运作，保证了明帝国的正常运转，但由于正德、嘉靖、万历三位皇帝，或贪图享乐，或沉迷道教，或疏于政务，导致了内政失修。官员也大多以权力、私利的获取为人生重大目标，政治日渐腐败和黑暗，加之宦官专权，明代中晚期可谓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皇族内部斗争，相继发生了南宫复辟的夺门之变、藩王朱宸濠的造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激化，由于“大礼议”之争，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嘉靖皇帝严重对立，万历年间又由于“立储”问题，皇帝和大臣们的矛盾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朝政愈加混乱。大臣之间的矛盾也是不断，首辅争权、内阁倾轧。从杨廷和到张璁，从夏言到严嵩，从严嵩到徐阶，以及后来的高拱与张居正，内阁首辅的更替都伴随有倾轧、斗争，甚至是流血事件。而且，在野士人与朝廷当权派之间也是矛盾纠纷不断，其中清流对张居正“夺情”行为的非议就是典型事件。

宦官专权。正统以后（1436～1449），皇帝多昏庸无能，

宦官谄媚皇帝以便乘机弄权。正德年间（1506～1521），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八人受到皇帝的宠信，时称“八虎”。其中刘瑾专权最为典型。他先是以内官监总督团营，继而又掌司礼监。刘瑾又设立内行厂，比东、西厂尤为酷烈。因此，他势焰熏天，党羽布满朝堂，连内阁大学士焦芳等都是他的爪牙。当时人都说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姓皇帝，一个刘姓皇帝。正德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正德时，厂、卫合势，特务布满全国各地，连居于穷乡僻壤的人民也深受其害。万历初年，宦官冯保也专擅威福。可以说，明代宦官专权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突出。宦官在政治上弄权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民财，巧取豪夺，勒索了大量财富。王振死后被抄家，搜出金银60余库，珊瑚高六七尺者20余株；从刘瑾家中搜出财物更是惊人，仅黄金就有24万锭，合57 800两，银元宝500万锭，碎银158万余两，还有宝石2斗，玉带4 000余条，此外还有其他大量财物。可见，宦官专权导致的贪污腐败是多么惊人。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弊端，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明代中期民变事件不断。万历二十四年（1596），湖广发生反对宦官陈奉采矿征税流血事件；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爆发了驱逐马堂的民变；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爆发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此外，江西景德镇、北京西山煤矿以及云南、西安、新会、广昌、香河、福州等地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反对税使矿监的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一直持续到明末，有的地方甚至演变成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其中在正统时，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他们以矿工、农民为主，曾攻占了闽、浙、赣三省部分地区。天顺、成化时，在荆襄山区又爆发了刘通、李原领导的大规模流民起义。正德年间，在河北又出现了杨虎、刘六等

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许多州县，“横行中原”，并曾三次进逼北京。此外，在四川、贵州以及广西等地，还先后爆发了许多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对明朝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内忧不停而外患又接踵而至。明朝中后期最严重的外患是西北面临蒙古瓦剌和俺答的入侵，正德十四年（1519）就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甚至被蒙古人俘虏。东北面临后金政权的扩张，满人努尔哈赤不断击败明朝军队，逐渐统一了东北地区。东南则不断遭到倭寇的骚扰，例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倭寇进攻宁波等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但是，与政治上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情形相反，在经济上，明朝中后期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有些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何心隐所生活的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经济之繁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明代初年，由于蒙古统治者多年的残暴统治，又加之连年的战争和动乱，民生凋敝。史书记载：“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皆流亡，地多荒秽”。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新王朝的建立者们，大多经历了这场战乱，了解到民众的疾苦，他们意识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比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而已”。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力图尽快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整个明代前期（主要是指洪武至宣德年间，包括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朝），统治者都较好地执行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概括为几个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所得归民所有，减免赋税；大量移民屯田，政府配发农具；鼓励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改善官营工匠状况。由于明初统治者所颁行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体察民情，顺应民心，而且政府将垦田的数量与官吏的奖惩升迁联系在一起，明政府的这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而且成效显著，社会生活很快安定下来，生产恢复迅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也逐步增加，为后来的永乐、宣德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到了何心隐所生活的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农业方面，不仅粮食产量提高了，而且耕作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看，当时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等各方面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番薯、玉米、棉花等多种经济作物得到大面积的推广种植。特别是，棉花由江南向全国的推广种植，“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而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矿业、制陶、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等方面。明代矿业有官矿和民矿两种类型。明代前期矿业的发展主要以官矿为主，由朝廷派官员直接经营管理。由于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又有大量民间商业资本的介入，民间采矿在明代中后期蓬勃发展。它不仅规模扩大，税收增加，矿产地也扩展到全国各地。制瓷业方面，江西景德镇已经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瓷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也取得许多新的成就。手工业生产的进步，还表现在工场内细密的分工上。在苏州丝织业中，就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工等专门的工匠，在织绸时还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明确分工。徽州的炼铁工场中有煽风、看火、上矿料、取矿砂、炼铸，场外有采矿、烧炭等工种，“各有其任”。精细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

在何心隐的家乡江西，农业和手工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农业方面，江西的水利建设在明代达到了高峰，取得了很大成



果，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修复，如宜春李渠在明代先后得到五次疏浚。结合江西多丘陵山区的农业地理特点，当时人们采用修陂塘以灌溉农田，又在临江地带建圩堤以防农田被水淹。而且注重水利资料的搜集与编纂，编著了专门的水利志书，如嘉靖三年（1524），江西编纂了该省历史上第一部《水利志》。这些措施都对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江西的林木贸易也是比较发达的，鄱阳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也一度非常兴旺。在手工业方面，江西赣州的种花业、江西广信府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都相当发达。何心隐的家乡吉安地区的制瓷业也曾经很繁荣，至今还保存有当时的古窑。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业中心的形成，出现了专门生产某些商品的地区。一些地区生产手工业原料，而另一些地区生产粮食或其他生活必需品，这样互为商品，活跃市场。当时商业城市繁荣，地域性经济特点凸显，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显示了各自的特点，如广州、漳州、泉州、福州等地既是对外贸易港口，又是商业都会，而江南地区也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区域。手工业小市镇也开始兴起。江南地区形势极为喜人，很有特色，由于当时的省治、府治所在地封建关系较重，许多商人便到封建关系较轻的城镇做买卖，这是城镇兴起的原因之一，如苏州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松江的枫泾镇、朱家角镇等。何心隐的家乡江西景德镇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二是白银的广泛使用，这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明初政府规定是不允许用白银交易的，正统时“弛用银之禁”。成化时，连朝廷官员一部分薪俸也用银折算，明中叶后，“朝野皆用银”，白银在社会上普遍流通。而且，随着



与外国经济的交流，大量的美洲和欧洲白银由日本、南洋流入中国。三是商业资本十分活跃。明中叶以后，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人，以及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了各种商帮，其中多数是中小商人，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富商大贾。商人的贸易活动已不单纯为满足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贩卖手工业原料、粮食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用品了。何心隐所处的江西有一大批人或离开家乡远赴外省经商，或留在本地经营，其规模完全可以媲美徽商和晋商。他们将江西的特产如陶瓷、茶叶、纸、糖、烟草、夏布等，贩卖至全国各地。江右商人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甚至深入云南、贵州到缅甸经商。他们在全国各地也相继建立了许多商帮组织，何心隐北上京城期间就是住在江右商人建立的江西会所。

如此一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必然受到巨大冲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生产者和市场联系更密切。比如松江府的农家以织布作为家庭副业，日成一匹，投入市场的棉布“日以万计”。无锡“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一到春天就关起门来在家纺织，抱布换米，“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万”。其他产品也一样相当活跃地涌向自由市场，这是前所未有的势头，“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分工发生了裂变。妇女从事的纺织已出现由男女共同承担的现象，而且男子的手艺也很细腻，比如《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地区自由集市上卖的纺织品相当一部分出自男子之手。显然，商品的观念使笨手笨脚的男子们变得心灵手巧。外出谋生的男子增多，传统封闭思想遭到冲击。劳动力变成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劳动从农业转向其他行业。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

出现的现象。

由此，在农业、矿业、纺织业、制瓷等行业中均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方面，雇工的出现，特别是江南地区货币地租的出现，导致了佃户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松动。矿业方面，由于班匠制度的变革，以及民间商业资本注入生产领域，工匠与政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匠班银”表明了工役制度开始瓦解。到了明末，工役制度变成了雇佣关系，民营手工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大量金银成为商品交易的主要货币形式。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陶瓷制造业中。徽商大量投资景德镇陶瓷业，支配了陶瓷作坊主、陶工和产品。同时，陶瓷业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出现了一批专门性的工商市镇，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就存在“每日不下万人”的“佣工”，他们就是靠工艺谋生的陶瓷生产工人，可见当时生产规模之大，而且工场内出现了专业、细致的分工。江南丝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更为明显。明朝丝织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在南京设置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这些都是官营，工人与官员的关系不是雇工和雇主的关系，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而在明代江南各地存在大批民间机户，这些机户一方面被编入匠籍，受官府的剥削，另一方面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和市场有密切联系，这些人容易产生贫富分化，比如，万历初，苏州富民潘璧成，其先世“起房织手”曾积累财富至百万。晚明小说《醒世恒言》上的一则材料也很典型，吴江县盛泽镇盛产丝绸，机户施复，从养几筐蚕不到十年，就开起了三四十张机的作坊。在棉纺织业中，两极分化也极明显，那些有技术但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家，只好替别人加工产品。万历以来，松江地区暑袜店的经营方式就是如此，“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酬取值”。这



些暑袜店商人变成包买主，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明代中后期经济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危机四伏。比如说，土地兼并严重，屯田制被破坏；赋役和地租的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加强，出现大量流民。当时商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稀疏、个别的，同时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的烙印，且其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和阻扰。这些问题，在明朝中后期一度引发了经济危机，张居正执政期间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

随着商业中心和城镇的兴起，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发展，这也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革，各种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由此，明代中晚期的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

明代中晚期，文化上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新四民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商人的地位逐渐上升，打破了已有的“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格局，有些地方出现了农商易位、士商并立的现象，甚至弃农从商、弃儒从商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改变，“士商农工”的新四民观逐渐形成。二是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明代中后期的市民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了，消费主体由新兴的市民阶层取代了官僚贵族，追名逐利取代了重义轻利，而且各种符合市民阶层口味、反映市民意识和观念的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各种市民小说、说唱杂记、戏曲表演等层出不穷。三是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特别是民间学术和教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可以轻易地募集到活动资金，自宋代兴起的书院讲学在明代中晚期发展迅速。据统计，有明一代全国各地所建书院共计1 239所，其中嘉靖至万历年间所建